

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学理支撑、现实挑战及完善对策研究

郑 鹏¹ 尤春艳² 李 峰¹

(1.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四川成都 610000; 2.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宣传思想政治教育局,重庆 400020)

摘 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强调“金融强国”建设目标。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与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高度一致,金融作为国民经济的血脉,可以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有力支持。阐明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学理支撑,在此基础上分析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金融供给质效有待进一步提升、金融有效需求仍需进一步激发和金融制度建设需要兼顾刚性与弹性。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即在金融供给端优化金融服务,提高市场效率;在金融需求端,推动风险分层,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金融制度建设中加强顶层设计,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

关键词:金融;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F83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4)012-0036-015

[文献标识码] A

[DOI 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4.012.003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入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强调“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前提,只有深刻理解生产力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考察时,围绕科技创新和振兴东北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1],要求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同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金融强国”的建设目标,强调把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以顺应时代之变,呼应时代之需^[2]。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进一步强调了“金融强国”建设目标,提出要健全宏观金融治理体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3]。由此可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与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国式

作者简介:郑鹏,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顺支行行长,中级经济师,研究方向:供应链金融;尤春艳,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宣传思想政治教育局副处长,工学博士,研究方向: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数字化与数字信号处理;李峰,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供应链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现代化的目标高度一致,金融作为国民经济的血脉,可以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有力支持。

一、问题的提出

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的提出和阐释,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力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同生产资料相结合而形成的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生产力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要素,任何要素的发展应用,都会引起生产力的变化甚至变革。从时代来看,新质生产力以第三次和第四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为基础,以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绿色化、高效化为主要特征。不同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作为主导推动力量,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作为主要产业载体,具有新的时代特质与丰富内涵。

随着对劳动力、生产资料、生产过程、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深化,人们逐步发展了对新质生产力内涵、外延和特征、发展路径^[4-7]等方面的探索。第一,从新质生产力发展内涵看,新质生产力是由“新质”和“生产力”两个概念组成。所谓“新质”,是指与“旧质”相对应,体现事物根本性质的改变、质态规定的更新,蕴含着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前进性、上升性态势。“新质”与“生产力”二者的概念合成,从字面意义上看,意指新兴的、升级的、先进的生产力,标志着生产力总体水平实现突破跃升的全新状态^[8]。在要素层面,内涵首先体现在高素质劳动者上,这些劳动者不仅具备丰富的生产经验和高级劳动技能,还拥有深厚的科学知识,成为推动新技术、新模式、新产业和新动能的核心载体。其次,新介质劳动资料通过科技创新不断改良和升级,具备绿色化、自动化、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等特性,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和质量。此外,科技创新扩展了人类的实践触角和生存空间,使得更多物质成为劳动对象,伴随着海量数据的生成和涌现,劳动对象的类别和形式也日益丰富。依据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概念的理解,新质生产力不仅是人们物质资料生产能力的飞跃,而且包含着人们精神财富创造能力的飞跃;它不仅体现人们控制、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水平跃升,而且体现人们美好生活需要得以满足和实现程度的跃升。总而言之,新质生产力是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改造自然与社会进步协调一致的多维度突破跃升^[4]。第二,从新质生产力本质特征看,新质生产力具有创新化、数字化、绿色化特点^[9]。从创新性看,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通过不断推动生产力核心要素的变革,进而推动生产力的全面跃升;从数字化看,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的发展,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通过新技术的应用,数字新质生产力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从绿色化看,通过技术创新,新质生产力致力于降低环境负荷,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随之相关,金融作为国民经济的血脉,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要支持作用。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学术界展开关于金融与新质生产力二者关系之间的讨论,研究重点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制研究。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制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通过金融手段有效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谭志雄等指出,数字金融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科技创新,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动力与支撑^[10]。黄丹荔等进一步探讨了数字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制与路径,指出数据作为一种新的金融生产要素,能够有效促进传统金融结构的优化升级,而完善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则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稳固的平台支持,强调金融创新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1]。与之相关,褚海玉研究了科技金融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指出科技金融作为连接科技创新与金融市场的桥梁,其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中也有重要作用^[12]。

二是关于金融与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合的路径构建。金融与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合的路径构建是实现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张壹帆等研究了科技金融与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模式,提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13]。金融创新可以通过提供多样化的融资渠道和金融工具,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从而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廖恒和邱志刚强调,通过调整、优化金融政策,从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进一步实现金融与新质生产力的深度融合^[14]。吴蔚指出,打通“金融—科技—产业”深度融合的痛点和难点,需要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进行系统性的改革和创新,以实现金融、科技与产业的协同发展^[15]。

目前,有关新质生产力的研究成果丰富。然而,从金融视角探究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文献较少,本文尝试填补这一空白,探究现阶段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挑战,并提出相对应对策,以期和政策决策者提供依据。

二、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学理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对金融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产业升级、动能转换、科技创新等领域都离不开金融的深度支持,金融能为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作用。本文从理论逻辑和作用机制两个维度,阐述金融在服务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学理支撑。

(一)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

在推动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金融的作用不可忽视。金融不仅仅是经济资源的提供者,更是资源优化配置、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推动力量。通过对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与技术进步的支持,金融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 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演变催生新质生产力

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包含劳动力、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大要素。与之对应,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依赖于生产要素的供给情况,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与新型劳动对象等要素供给。首先,新型劳动者是知识型、技能型和创新型的劳动者,他们具备更高的素质和创新能力,能够熟练掌握满足时代发展需要和产业转型要求的技术和技能,同时兼

顾生产的效益与质量。金融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提供政策性金融、技能培训专项基金、培植初创企业等方式,促进劳动力素质的提升,推动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创新能力的增强。其次,新型劳动资料主要为“高端、精细、尖端”设备,这些设备可以有效解决供给体系中的不匹配、不安全和质量不高等问题。金融通过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贷款以及资本市场提供资金支持,帮助企业投资于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完成数字化转型,从而实现劳动资料的现代化和高效化。风险投资和科技贷款等金融工具有助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从而推动新技术、新工艺的研发和应用。最后,新型劳动对象包括物质形态对象以及非物质形态的对象,不仅仅是传统的原材料和自然资源,还涵盖了现代技术和数字资源。金融通过提供创新型金融产品和服务,支持这些新型劳动对象的开发和利用,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2. 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核心标志,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是总产出与总投入之比,可以通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得到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的初步框架^[16]。 $Y_i=A_i \cdot (HL_i)^\alpha \cdot K_i^\beta$ 。其中 Y_i 代表经济产出; A_i 代表总体技术水平(即全要素生产率); H_i 代表劳动力素质, L_i 代表劳动力数量; K_i 代表资本投入量; α 和 β 是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在产出中的相对重要性或者说是对其的贡献率。在 HL_i 短期供给量和产出弹性 α 变化不大的情况下,需要提升 A_i 和 K_i 来促进 Y_i 的增长。相似地,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金融市场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通过提供资本和分散风险,金融市场支持企业的创新活动,进而促进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推动经济增长。同样,熊彼特创新理论强调了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指出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和产业转型角度看,新质生产力依靠技术革命性突破实现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从而提升要素组合效率,实现产品和服务的产出增量。同时,技术对其他要素的组合具有催化作用,技术进步可以促使劳动、土地、资本等要素重新组合,并发挥乘数效应。首先,金融通过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促进数字化转型和技术升级,使企业能够更好地利用数字化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其次,金融通过支持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和创新型互联网企业的发展,推动网络化进程,增强经济活动的互联互通。智能化赋予机器、设备和系统自主决策和学习的能力,使得生产过程更加智能化和自动化,推动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能医疗等领域的发展。金融支持智能化项目的融资需求,促进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推广。最后,金融通过风险投资、创业投资等方式,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因此,通过金融的赋能,劳动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得到优化配置,技术革命性突破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得以实现,最终催生了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 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

金融在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资源配置、风险管理与分散,以及信息集成与传递三个方面。通过这三种机制共同作用,确保金融资源能够有效支持和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

1. 资源配置作用

金融作为资源配置的枢纽,能够有效引导资金流向,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使有限的资源配置更加合理^[17]。一方面,新兴产业和创新项目往往伴随着较高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金融市场通过提供广泛的融资渠道和投资工具,为其供给必要的启动和运营资金,实现资金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的流动。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进程中,这意味着资源将优先配置给那些具有高增长潜力、技术创新能力强的高新技术产业和企业,从而加速这些领域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金融服务通过市场化、国际化的运作机制,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金融市场的价格信号功能能够有效反映各行各业,尤其是新质生产力领域的投资价值 and 风险,引导社会资本流向最能够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的领域,促进了经济资源在更广阔领域和更高层次的优化配置。此外,金融服务的创新(如绿色金融、科技金融等),也为资源配置注入了新的活力,进一步提升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果。

2. 风险管理与分散作用

金融在服务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进程中,通过风险管理和分散作用,降低了新兴产业和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为创新活动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支持环境,确保这些投资的风险被妥善管理和分散,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份投入资金的潜在价值^[18]。一方面金融机构在提供融资服务过程中,通过对借款人和投资项目的细致评估,能够识别和分析各种潜在风险,提供关于项目风险水平的准确信息,帮助投资者做出更为明智的投资决策,金融机构的风险评估和管理能力不仅减少了投资损失的可能性,还通过风险的有效分散和对冲机制,增加了投资者对创新项目的信心,进一步推动了资金向新质生产力领域的流动。另一方面,通过多元化的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股权融资、债券融资、保险产品及其衍生品市场),可以有效分散企业创新活动风险,鼓励他们更多投资于研发和创新,从而有利于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此外,金融市场的风险定价和分散机制也为企业提供了更为稳定的融资环境,减少了因市场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从而确保了新质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

3. 信息集成与传递作用

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市场中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市场失灵。金融市场和机构能够集成并处理大量关于市场和企业的信息,包括投资者、企业家及创新项目的信息。这种信息的集成和传递作用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提高了市场信息透明度和可获取性,从而提高市场效率,减少交易成本和风险,促进投资者和企业之间的有效匹配,加速资金流向有潜力的创新项目^[19]。此外,通过这种信息传递,金融市场可以建立更广泛的市场链接,扩大企业的市场接触范围,促

进产业链的整合和协作,提高企业竞争力。

综上,金融通过资源配置、风险管理与分散以及信息集成与传递机制,有效的服务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三、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

尽管金融在促进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面临诸多挑战。从金融供给、金融需求和金融制度三个方面,阐述现阶段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过程当中面临的现实挑战。

(一)金融供给质效有待进一步提升

1.传统金融服务质量亟须提高

从现实情况看,我国金融资产中90%以上为银行资产,科技创新类企业获得融资最直接的方式仍然是银行信贷。根据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末,我国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为242.24万亿元,贷款投向到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额为2.45万亿元,虽然较2022年同期增长21.9%^①,但不可忽视的是流向科技创新领域的资金总量仅占我国金融供给总量的1.01%。

一是传统金融低风险偏好与科技型企业高风险特征不匹配。以银行业为首的传统金融机构的运营模式强调稳定性和风险最小化,通常采取以物质资产为基础的抵押或质押作为信贷风险的缓释手段,而科技型企业往往具备“轻资产、高风险、高成长”的特点,缺乏足够的物质资产来为贷款担保,大规模金融资本难以流向科技创新领域,导致金融供给科技创新总量不足。

二是传统金融服务效率与科技型企业需求时效不适应。当前,传统金融在服务科技型企业融资中,其实质仍然采用被动授信、单个授信方式^[20]。基于商业银行传统授信管理体制下,单笔贷款仍然需要经历尽责调查、风险评审、审批发放等众多环节,同时由于科技型企业行业类别差异较大,导致企业营收模式、资金管理模式各异,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不同环节,加之银行风险偏好与风险标准不一、难以制定标准化产品,基层银行审批权限小、人为因素风控理解不一等因素,仍然存在一户一审批流程长、时效慢的痛点、难点,从而难以满足科技型企业阶段性融资需求,导致了部分优质科技型企业无法寻找适合自身业务发展的金融产品。

三是传统金融对未来产业理解有限导致服务科技型企业不精准。为服务新兴产业,金融机构纷纷设立“专营机构+专业团队+专项授信+专属产品”服务模式,试图通过业务模式创新、产品创新等方式抢占优质科技型中小企业^[21]。在传统金融机构大规模实际开展科技型企业信贷业务过程中,因科技企业高专业壁垒、高技术壁垒、涉足行业领域繁多带来了识别难题,银行很难对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和信用能力进行评估,缺乏科技理解维度的数据风控能力。此外,基于

^①2023年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情况[EB/OL].[2024-2-21].<https://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109311&itemId=954&generaltype=0>.

传统“名单制”接触企业,一方面极易出现良莠不齐、不够精准的情况,另一方面容易造成严重“两极分化”问题。在科技型企业信贷服务中,金融机构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行业内的头部企业,竞相提供更高的授信额度和更低的利率,试图吸引此类头部企业,做到“锦上添花”,却难以“雪中送炭”。这种现象加剧了市场的“两极分化”,即那些实际上可能对传统信贷需求并不大的头部企业获得的金融资源溢出,而那些具有发展潜力但短期内营收情况可能不佳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则遭到忽视。

2. 直接融资市场信用结构分层亟须优化

企业所处发展阶段不同,所面临的信息约束、经营特征和资金需求也明显不同,由此导致其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存在明显的差异和变化,需要金融市场为其全生命周期提供可持续性的支持和保障^[22]。单单依靠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市场难以满足科技型企业差异化融资需求,需要引入风险偏好相对较高的权益资本,提高对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初期收益不确定性的容忍度,从而更好支持初创科技企业发展。

一是直接融资市场体系不完善。我国直接融资市场,尤其是股权融资市场仍然不够成熟,市场机制、法律法规体系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比如,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交易规则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规范和优化。此外,VC/PE 在我国的分布呈现明显的地域和行业不平衡。一些热点地区和行业(如互联网、高科技等)能够吸引大量的资金,而中西部地区、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和初创阶段的企业则面临融资难的问题。

二是一级市场退出机制不顺畅。在 VC/PE 等直接融资领域,一大突出问题就是投资者在合适的时机、以合理的价格将其投资转换为现金退出较为困难,基本都要靠 IPO 实现退出,当面临一级投资过热和 IPO 遇冷的一二级周期叠加调整时,更加限制资本有序退出路径。首先是 IPO 的门槛较高,由于监管要求、市场环境、企业自身条件等因素,许多企业难以满足上市条件,或者在排队等待上市的过程中耗时过长,直接限制了 PE/VC 投资者通过公开市场退出的机会;其次是并购市场不成熟,由于企业文化差异、估值分歧、法律法规限制等因素,通常都会影响并购的顺利进行;最后是一级市场流动性不足,投资者难以在理想的时机以合理的价格完成股份的出售,一些投资人便将被投企业出售给过去投资的已上市公司,甚至还有被投企业刚上市就在投资人的主导下转让控制权。

三是证券市场融资门槛相对较高。在债券市场上,由于民营企业抗风险能力弱、投资机构避险情绪和发债审核流程繁琐等原因,远低于股权融资比例,同时发债主体往往是中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从企业属性看,民营企业直接融资难度更大。截至 2023 年 6 月末,存续民营企业债券总额为 22 690.96 亿元,占存续债券总额的比重仅为 5.04%^[23]。在股票市场上,由于新兴产业中的企业往往探索前沿技术,其商业模式和盈利能力在初期不明确或不稳定,使得传统的上市评估标准,如连续盈利记录等难以适用,导致其在满足上市条件方面面临困难。截至 2024 年 2 月底,新质生产力板块在 A 股中市值占比仅为 6.6%,2023 年三季度归母净利润占比为 3.4%,

以战略新兴产业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在经济中占比为 13%^①。

(二)金融有效需求仍需进一步激发

1.消费需求 and 可投资本有待释放

一是收入不及预期制约消费需求。2022 年,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放缓至 3.95%^②,这一增速仅相当于疫情前水平的一半,反映出持续三年的疫情对就业市场和工资稳定性的影响,进而影响了居民的收入预期。根据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 2 月末,我国的本外币存款余额达到 296.58 万亿元,年增长率为 8.1%,其中居民存款增加了 5.73 万亿元^③。面对未来经济和收入增长的不确定性,我国居民倾向于通过增加储蓄来防范风险,显示出对未来的谨慎预期。2023 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 292.27 万亿元,同比增长 9.7%,而狭义货币(M1)余额为 68.05 万亿元,年增长率仅为 1.3%^④,大量的活期存款转为预防性定期储蓄,凸显出货币传递机制的不畅,降低了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效率。依据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尽管居民消费倾向通常与其收入水平成正比,但并非所有的增加收入都将用于消费,部分将转化为储蓄。居民存款的显著增加反映了其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显示出在面对经济不确定性时,居民选择了更为保守的财务策略。

二是资本沉积地产和基建领域,投资关键支撑作用受限。在过去几年,我国资本在房地产和基础建设领域积累显著,但这两个领域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推动作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24]。到 2022 年,我国商业地产的累计投资额达到了约 17.9 万亿元人民币,而商业性房地产贷款的余额也高达 53.2 万亿元人民币。这表明大量的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在房地产行业内部积聚,而房地产行业资金的筹集渠道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社会化和内部化的方式。同时,在 2017 年到 2022 年期间,中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累计投资呈现了 3.6%的复合增长速度,城投债的余额也从 6.28 万亿元增长到 13.5 万亿元^⑤,由于基建项目的投资回报周期较长,且债务压力较大,使得政府和企业 在扩大投资规模时面临债务水平约束限制。

2.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仍需完善

当前,金融资源高效进入实体经济还存在着基础信用数据缺乏,数据获取渠道支离破碎,风控模型技术瓶颈障碍等客观不利条件。地域分割、条块分割、行业分割、部门分割、技术分割等烟囱林立的“信用信息孤岛”仍然存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①“两会”热点:新质生产力在股市的映射,附细分产业特征梳理[EB/OL].[2024-3-6].<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92730524330874968&wfr=spider&for=pc>.

②人民生活实现全面小康,稳步迈向共同富裕——新中国 75 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七[EB/OL].[2024-9-20].https://www.stats.gov.cn/sj/sjtd/202409/t20240920_1956592.html.

③2024 年 2 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EB/OL].[2024-3-16].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3/content_6939735.htm.

④2023 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EB/OL].[2024-1-12].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1/content_6925677.htm.

⑤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 2023[EB/OL].[2024-3-15].<https://data.mofcom.gov.cn/report>.

一是信用评估体系不完善。尽管近年来国内信用信息系统建设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中小企业、科技企业等领域,信用信息的收集和记录仍然存在盲区,导致部分主体的信用状况无法准确评估,影响了该类企业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同时,我国金融市场在信用评估上往往依赖于传统的财务指标和历史信用记录,缺乏对非传统数据(如大数据、社交网络信息等)的有效利用,无法全面反映融资主体的信用状况。

二是信用风险分散机制不健全。传统产业信用风险过于集中,在信用分层不足的情况下,金融机构更倾向于向信用等级高、风险较低的客户提供服务,导致信用资源向国有企业和龙头企业集中,产业链上信用传导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加剧了市场的信用风险分布不均。此外,由于缺乏有效的信用风险转移工具,信用衍生品等风险转移工具在我国金融市场的应用还不够广泛,限制了风险分散的能力,当市场出现波动时,常常出现行业一刀切的情况,容易加剧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三)金融制度建设需要兼顾刚性与弹性

1.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仍存在矛盾

金融创新包括新的金融产品、服务、技术和模式,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例如,互联网金融服务能够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为更多的创新项目和小微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然而,金融创新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未经充分测试的新产品和服务可能存在系统性风险,威胁到金融系统的稳定^[25]。新的业务模式可能绕过现有的监管框架,导致不公平竞争、市场失灵甚至金融诈骗等问题。现阶段,监管机构面临如何制定和调整政策,以适应金融创新带来的变化,保护投资者利益,确保金融市场的公正和稳定为前提,同时又不制约创新进程的挑战。具体来说,一是要严防监管框架与市场实际脱节。现有的监管框架往往基于传统金融业务和风险模型设计,难以有效覆盖新兴的金融活动和业态(如互联网金融、数字货币、区块链技术应用等),这种脱节使得新兴业态在无监管或低监管的环境中快速发展,可能孕育金融风险。二是要注意监管技术与金融科技发展不匹配。金融科技的发展带动了金融业务处理方式、风险控制手段的革新。然而,监管技术的发展相对滞后,使得监管部门难以有效识别、评估和应对由新技术引发的风险。三是要解决跨界金融活动的监管难题。金融创新往往打破传统行业界限,涉及多个监管领域和法律体系。如互联网企业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其业务跨越了金融、科技等多个行业,使得监管责任分配模糊,加大了监管难度。

2. 知识产权和金融债权保护力度不够

在金融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质量进程中,知识产权保护不足会削弱金融创新的激励机制且导致企业难以通过知识产权进行融资,金融债权保护力度不够会直接影响到金融市场的信用体系和资金流动性。

对于知识产权,现阶段主要存在以下挑战:一是法律层面执行难度大,侵权识别难、证据收集难、赔偿标准低和执法力度不足,导致实际保护效果大打折扣;二是侵权成本低,被诉侵权所需承担的法律后果远低于从侵权中获得的利益,使得部分个人或企业冒着被法律追究的风险

进行侵权;三是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未能有效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四是创新与保护机制不匹配,随着新型的知识产权形式不断涌现,如数据权、人工智能创作等新领域,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往往难以及时适应这些新形式的保护需求,导致新型创新活动在获得法律保护方面存在空白或不足。

对于金融债权,在企业无法按时归还债务甚至破产重组时,由于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金融债权往往难以同其他债权一样得到平等保护^[26]。地方政府和人民法院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帮助企业脱困和兼顾各方利益,金融机构的金融债权通常成为“被平衡”的一方,一定程度上打击了金融机构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性。

四、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为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于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针对当前面临的现实挑战,本文从金融供给端、需求端以及金融制度建设三个方面入手,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通过优化金融服务、提升市场效率、完善信用体系建设和加强金融制度创新,能够更有效地支持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推动经济的全面升级与转型。

(一)在金融供给端,要优化金融服务,提高市场效率

1.加强传统金融服务质量,实现传统金融与科技金融的高度融合

一是采取差异化信贷管理办法。首先,金融机构要改变过去以企业规模作为评价企业优劣的绝对标准,更加注重对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科技成果转化潜力、研发费用占比、人力资本构成等多维度的评价体系;其次,金融机构要加强与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的联动,建立公开的知识产权评估和交易平台,改变知识产权难估值难交易的现状,使知识产权的价值具备市场认可度,从而成为金融机构认可的抵质押物,不仅科技型企业更易获得银行信贷,银行机构也降低信贷风险。

二是提高银行信贷支持效率。首先,金融机构要充分发挥产业链链主企业的金融要素积聚优势,聚焦主责主业,围绕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共同构建基于产业链、供应链的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垂直与横向整合能力,鼓励将链主企业的信用价值在整个产业链中实现价值传递,扩大规模批量授信产业链上中小企业,节约其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从而使金融要素顺畅流入产业链各个环节;其次,金融机构需要培养更多高素质、专业化和跨学科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精准识别和判断这些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用等级,同时大力发展金融科技,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手段,提供更加精确的数据分析和风险预警;最后,金融机构由利益导向转变为企业导向,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定制个性化的高质量金融服务,充分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

三是加强金融市场科技应用。首先是推进金融科技创新。金融机构运用金融科技手段,提

升金融服务效率和客户体验,如采用区块链技术提升交易的透明度和安全性,利用人工智能进行精准的风险评估和市场预测;其次是构建智能金融服务平台。金融机构应构建集成化、智能化的金融服务平台,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涵盖信贷、投资、保险等多种金融产品,满足企业的多样化需求;最后是推动数字金融普及。通过发展移动支付、电子钱包等数字金融产品,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特别是支持中小微企业和偏远地区的金融需求。

2. 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第一,进一步完善主板市场。一是优化上市标准和流程,定期评估和调整上市标准,如财务指标、公司治理结构等,以反映市场变化和经济发展需求;二是简化审批流程,采用更高效的审核方式,如信息披露为中心的审核机制,减少企业等待时间,提高市场吸引力;三是加强上市后监管,引入更多的市场化监管工具,比如采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市场监测,及时发现异常交易行为,强化持续信息披露要求,确保公众及时了解上市公司的真实运营状态;四是优化资本市场体系结构,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改革,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第二,着力优化中小板和创业板。一是引入差异化上市标准。为适应中小板和创业板企业特性,制定更加灵活的市值、盈利等上市标准,扩大对在审企业及相关中介机构现场检查覆盖面,允许在研发阶段或初创期的企业通过展示其长期增长潜力而不是短期盈利能力来满足上市条件;二是提供差异化服务。建立专门的辅导机制,提供包括但不限于法律、财务、市场营销在内的全方位服务,帮助企业理解市场规则,准备上市所需的各类资料,提高上市效率。

第三,做深做实新三板和区域性股权市场。一是要进一步增强新三板和区域市场活跃度,深化新三板改革,促进区域性股权市场规范发展,进一步畅通“募投管退”循环,发挥好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支持科技创新作用;二是增设分层管理,对不同层次的企业采取不同的交易规则,满足多样化的投资需求;三是支持区域性股权市场发展,鼓励地方政府和行业协会建立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为本地企业提供更便捷的融资渠道。同时加强监管,确保交易公正、信息透明;四是加强监管防范风险,压实交易所审核主体责任,完善股票上市委员会组建方式和运行机制,加强对委员履职的全过程监督。

(二) 在金融需求端,要推动风险分层,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1. 以风险分层丰富财富管理供给,激发投资热情

在现代金融理论和实践中,风险分层是推动财富管理市场多样化、满足金融消费者需求的关键策略,从而进一步打通合格投资者投资证券投资基金、REITs、私募股权、保险、信托产品等的渠道和隐形束缚,切实建立分层次的市场利率水平,引导资本加强对创新型产业的支持。具体而言:

一是构建多层次、阶梯式产品库。发展全周期(短期、中期、长期)、全类型(债券、股票、衍生品等)、全风险等级(低风险、中风险、高风险)的产品库,以实现财富管理市场的细分化和个性化服务,为投资者提供更为精准的资产配置方案。

二是完善财富管理产品体系。通过丰富和完善财富管理产品,加强金融产品的供给多元

化,满足不同风险偏好和投资目标的金融投资需求,包括开发新的金融工具、优化现有产品结构,以及提高金融服务的专业化和定制化水平。

三是促进投资策略多元化。通过推动投资标的的多样化和投资策略的差异化,提升市场参与者的资产配置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有助于在市场剧烈波动时分散风险,避免策略趋同导致的市场踩踏和负反馈循环,维护市场稳定。

2.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在有效保护隐私和基于市场化、法治化运用的前提下,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让市场主体的全生命周期信用信息能够管得住、看得见、用得了,这样才能增强金融市场透明度,为金融机构赋能,进一步优化金融产品和服务,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与防范化解风险,装上“夜视仪”和“望远镜”,确保产融互动行稳致远,高质量发展。

一是建立全面的信息收集与共享机制。信息不对称是影响信用体系有效运作的主要问题之一。为此,需要建立全面的信用信息收集和共享机制,包括但不限于个人信用记录、企业经营状况、金融交易历史等信息的收集。通过整合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商业信用服务机构等多方面资源,构建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实现信息的有效共享和利用。

二是发展多元化的信用评价体系。有效的信用评价体系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关键。除了传统的信用评分模型外,应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手段,根据不同市场主体的特性发展多元化、定制化的评价模型,包括对个人信用状况的评估,也包括对企业信用等级的综合评价。评价体系应当具有公平性、透明性和科学性,能够准确反映主体的信用状况。同时,建立动态的信用监测机制,实时更新信用信息,确保信用评级的时效性和准确性。

三是推广信用产品和培育信用文化。首先,鼓励金融机构和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开发创新的信用产品和服务,如信用衍生品、信用保险等,以满足市场对风险管理工具的需求,丰富信用传导机制;其次,加强对全社会公民的信用教育,提高社会对诚信的认识和重视,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可通过媒体宣传、公共活动等方式,增强公众的信用意识,促进诚信行为的社会化。

四是推广跨境信用体系建设。稳慎拓展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优化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推进自主可控的跨境支付体系建设,强化开放条件下金融安全机制。建立统一的全口径外债监管体系。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

(三)在金融制度建设中,要加强顶层设计,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

1.强化金融监管,实现产业与金融创新有机统一

一是建立灵活的监管框架和实施适度监管。充分发挥“监管沙盒”机制,允许在控制的环境下测试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以评估其风险和效益。同时,根据金融创新实践的反馈和市场发展的需要,及时更新和调整监管政策,确保监管框架的适时性和有效性。监管机构在制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监管措施对金融创新和产业市场发展的潜在影响,避免采取过于严格或过于宽松的监管措施。可以根据金融机构的类型和服务的特点,实施分层次的监管政策,既能有效

管控风险,又能避免一刀切的监管措施抑制创新。

二是加强监管技术的运用和促进信息共享与合作。通过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尖端技术手段,使得监管机构能够实时跟踪产业市场变化,有效执行风险预警机制,并以更高的精度识别及应对由金融创新引发的产业市场风险。此外,强化监管体系内部及其与金融机构间的信息共享与合作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构建信息共享平台,不仅可以提升信息的透明度和获取的便捷性,而且能够显著增强监管决策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国际间的监管合作,与全球有关监管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共享有关跨境金融活动的监管信息,是协同应对全球金融场所面临的跨境风险与挑战的关键策略。

三是完善风险管理和建立激励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建立健全风险管理体系,鼓励金融机构根据自身的业务特点,建立和完善内部风险管理体系,提高风险识别、评估、监控和处置能力。要求金融机构不仅关注单一风险点,而应采取综合风险管理策略,考虑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等多种风险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综合影响。鼓励金融机构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企业积极参与金融创新,政府可提供税收优惠、资金补贴、信贷支持等激励措施,特别是对那些在风险管理和创新产品研发上表现突出的机构给予正向激励。对于不可避免出现问题的金融创新活动,需要有明确的市场退出和风险处置机制,确保即便在面对失败和损失时,也能够有效保护投资者权益,维护市场秩序。

四是强化监管责任和问责制度。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强化监管责任和问责制度,加强中央和地方监管协同。建设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统一金融市场登记托管、结算清算规则制度,建立风险早期纠正硬约束制度,筑牢有效防控系统性风险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健全金融消费者保护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机制,构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防火墙”。

2. 健全法律法规,完善创新制度建设

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而知识产权保护和金融债权保护作为良好创新外部环境的基本要素,需要配套完备的法律法规。

针对知识产权保护,首要任务是持续优化和完善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律框架,确保形成一个既尊重又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环境,包括对现有法律的修订和完善,也涉及新法律的制定,以覆盖新兴知识产权相关问题。其次,必须增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实际效力,提高对侵权行为的处罚力度,通过法律手段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确保知识产权得到有效保护,从而对潜在的侵权者形成有效的威慑。最后,建议设立专门的审查机制,对重大经济活动中涉及的知识产权进行特别审查,以防止关键的自主知识产权被非法转移或流失,确保在重大交易或合作中知识产权的保护得到前瞻性和针对性的考虑,避免对国家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造成损失。

针对金融债权保护,一是要不断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等法律法规建设,在法律层面赋予金融债权人在企业破产重组过程中的特殊参与权和持

续监督权,降低债务人转移资产逃废债的可能性;二是要坚持“金融债委会”制度,在法律层面清晰界定其法律地位,增强其决议强制性,同时做好“金融债委会”和“破产债委会”的衔接工作;三是要持续加强金融执法力度,将企业或企业负责人逃废债行为纳入刑法领域,细化和量化债务人逃废债认定标准,加强制裁处罚力度,保证法律的权威性。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时强调 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 奋力开创黑龙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23-9-8(1).
- [2]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23-10-31(1).
- [3]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2(1).
- [4] 任保平,王子月.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重点、任务与路径[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4(1):3-11.
- [5] 姚宇,刘振华.新发展理念助力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4(2):3-14.
- [6] 钞小静,王清.新质生产力驱动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与路径[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4(1):12-20.
- [7] 杜仕菊,叶晓宣.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发展的逻辑理路、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6):52-61.
- [8] 翟青,曹守新.新质生产力的政治经济学阐释[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4(2):15-23.
- [9] 尤亮,田祥宇.农业新质生产力:现实逻辑、内涵解析与生成机理[J].经济问题,2024(6):27-35.
- [10] 谭志雄,王伟,穆思颖.数字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24(4):28-36.
- [11] 黄丹荔,乔桂明,周雷.数字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制与路径[J].上海商学院学报,2024(3):38-51.
- [12] 褚海玉.科技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研究[J].老字号品牌营销,2024(10):40-42.
- [13] 张壹帆,孙嘉雯,陆岷峰.铸造新质生产力:科技金融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的路径与模式研究[J].农村金融研究,2024(5):70-80.
- [14] 廖恒,邱志刚.金融助力新质生产力的长效机制研究[J].理论与改革,2024(3):52-61+159.
- [15] 吴蔚.打通“金融-科技-产业”深度融合痛点难点[N].经济参考报,2024-05-27(8).
- [16] 薛宏立.金融赋能高质量发展探究[J].中国货币市场,2023(6):6-12.
- [17] 沈冰,肖赫文.金融推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J].当代金融研究,2023(12):1-11.
- [18] 何秋洁,何香玲,陈国庆.金融发展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的长效机制研究[J].当代金融研究,2023(11):1-14.
- [19] 陆岷峰.科技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经典理论、理论框架与应对策略[J].改革与战略,2024(3):1-13.
- [20] 李学武.金融支持科创产业的模式、问题及突破点[J].银行家,2020(12):59-63.

- [21] 陆岷峰.商业银行在铸造新质生产力中的地位与路径[J].江南论坛,2024(2):28-33.
- [22] 许林.企业生命周期下区域性股权市场金融服务体系构建——基于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视角的探讨[J].开发性金融研究,2018(3):12-19.
- [23] 邵鹏璐.民企债券融资难困局究竟困在何处[N].中国经济导报,2023-12-05(3).
- [24] 周晔,丁鑫.科技赋能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了吗?——基于金融供求结构视角[J].国际金融研究,2023(10):50-61.
- [25] 王羚.审计视角下的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博弈[J].审计观察,2023(12):84-91.
- [26] 邢瑜.企业破产中金融债权保护法律问题的规范化处置[J].法制博览,2023(11):81-83.

Research on the Academic Support,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Improvement Countermeasures of Finance in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Zheng Peng You Chunyan Li Feng

(1,3.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Sichuan 610000; 2.Chongqing City Board of Education, Chongqing, 400020)

Abstract: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ed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further emphasize the goal of building a financial power.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financial powerhouse and vigorously developing new productive forces to achieve the goal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re highly consistent objectives. As the lifeblood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finance can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the formation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This paper first explains the academic support of finance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On this basis, it analyzes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faced by finance in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the need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in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upply, the need for further stimulation of effective financial demand and the need for financial system construction to balance rigidity with flexibility. Finally, targete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including optimizing financial services and improving market efficiency on the supply side; promoting risk stratification and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credit system on the demand side; strengthening top-level design in financial system construction to create a favorable environment for innovation.

Key Words: Finance; New productive forc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易晓艳)